

时代精神转向时的牺牲品孔融

历史随笔



北溟鱼著
东方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魏晋名士给这个时代抹上了一道永恒的、迷人的、惊艳的色彩。魏晋名士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是历史上最“装”与最不“装”的那群人，但装与不装的人，都成了贴在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审美标本。

几年前，低调的南京女孩北溟鱼凭着一篇作文就上了清华大学，比当年钱钟书先生还要轻松。从《风流绝》中，读者或可看见她那作文的水平。

孔融是东汉末年乱世的最后一儒者，尽管在这个时代，儒者的名号已经被乡愿们（乡愿，指貌似忠厚、实与恶俗同流合污的人。本报编辑注）搞得臭不可闻，但孔融还是笃行他的忠。他像是个剑客，单枪匹马地想要恢复一种时代精神，却和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一样，成为这个时代扎眼的不和谐。

作为孔子的后人，孔融是一个讲学习、讲政治、又讲正气的人。他是仁爱思想的好学生，不仅让梨，亦让生，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史书中就荡气回肠。

孔融十六岁的时候，一个叫张俭的人因为受宦官迫害逃到孔融家，孔融想也不想就收留了他。张俭是东汉末年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发起人，他和大宦官侯览是同乡，因为上书弹劾侯览，大骂其家人在山阳郡的恶行而被追杀。然而当时清流敬重张俭的行止，争相收留他，有十几户人家为此被灭族。

孔家就是这第N+1户。不久事情就败露了。庇护罪犯，轻的要被打屁股，重的要被咔嚓。问题却来了，张俭本来是来找孔融的哥哥孔褒，孔褒不在家，孔融才收留他，兄弟两人，到底判谁死？

孔褒说，张俭是来找我的，事情自然是我挑起的，和我弟弟没关系。

孔融说，人是我留的，祸是我闯的，跟我哥哥有什么关系？

年轻的孔融已表现出一股侠气。

当年名满天下的孔融即将在洛阳开始他的仕途，只是不巧恰逢董卓进了洛阳。孔融怎么会待见这种没文化又杀人如草芥的莽夫？两人互相看不顺眼，此时山东北海郡刚好闹黄巾军起义，董卓干脆把他下放到那儿，想借刀杀人。孔融也确实没有让董卓失望，他把那些在和平时代大量需要却在战争年代一无是处的事情全搬到了北海去：修学校，招募有学问的人，大搞文化活动，赡养孤寡老人。于是黄巾军打过来，风卷残云。

人家曹操靠着收服的一支黄巾军打下大半个中国，可孔融却被黄巾军打得丢盔弃甲，可见孔融是特别固执的那一类人。孔融对时局变动的接受力是很差的，更不用说让时势为我所用。孔融只是像郭靖一样坚韧而又善良，这一点掩盖了他的所有缺点，让他自然地被人认作是天下第一；他在北海赡养过一个孤寡老人，那人正是东海太史慈的老母，黄巾军打过来，孔融让太史慈向当时的平原相刘备求救。本来可以装大爷一把的刘备受宠若惊：没想到孔融还知道我！立即派了三千人马过去。在刘备的心中，孔融向他借兵，就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

名声也是无形资产。孔融本来能靠着他的名声随便跟一个军阀混吃混喝，享受上宾待遇，可孔融有个坏习惯，作为汉末清流的一员，他习惯性地要参与政治，治国，平天下。这些是他活着的根本动力，他觉得，矫正掌握着汉献帝的曹操的坏习惯，他责无旁贷。

但曹操是聪明的，孔融有才华，有学问，可是没有用。曹操懒得听孔融唠叨，但是孔融有名声，所以曹操把他像活菩萨一样供起来。

可孔融不理会曹操的意思，自己以为还身有一个朝廷命官必须有的监督职责，而监督最有权力的人则是刚正和忠诚的人最大的义务。

曹操当时是“老子天下最大”，又不拘小节，送到孔融面前的忿子是一筐连着一筐：

为了防止浪费粮食，曹操颁布了一道禁酒令。这是让孔融不能容忍的，倒不在于被剥夺了对酒当歌这样潇洒的乐子，而在于酒本身就是一种礼仪。祭祀要酒，邦交要酒，就是在乡党之中和老年人联络感情表达尊敬也要靠喝酒，连小辈如何敬酒都有讲究。一旦不能喝酒，都变成白开水，比

21世纪大城市里过年不能放鞭炮烟火严重多了。

孔融自然又洋洋洒洒写了两篇文章，说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尧和孔子的德行因为酒而彰显，景帝要不是因为喝醉了酒临幸了唐姬，汉朝的中兴就没了；酙食其要不是高阳酒徒，便不能为汉朝立功。酒对国家的好处这么多，干吗要禁酒？

这段话说上去，曹操骂了孔融一顿，告诉他因为酒亡国的事情数不胜数。

孔融又说，干吗要把亡国的事情推到酒的身上？是你自己怕粮食不够吃吧！别找借口了。

曹操没再理他，但是孔融却感到自己受了轻视。

曹操打袁绍，打下来一个战利品：漂亮女人甄氏，原来自己想要，结果儿子先提了，老子总不能不讲风格，于是把甄氏让给了曹丕。

这件事情在曹操相府里影响比较恶劣：漂亮的女儿一向是亡国祸水，夏商周三代，一个妹喜，一个妲己，一个褒姒，多了没有，一朝一个，刚好葬送几百年的基业。近了就是这个甄氏，把袁绍给害死了吧。

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曹操性情多变，现在和你称兄道弟，心里面说不定就想着怎么看你脑袋搬家，只有许攸那样的傻人才会叫着人家的小名兄道弟，以为曹操还是当年那个街头恶少呢。

可是孔融敢。没过两天，就当大家以为此事已经过去了的时候，孔融的一份考古发现呈到了曹操的面前：武王灭商，妲己并不像历史上说的那样被赐死，而是被赏赐给了周公。

历史八卦，是个人就感兴趣，何况曹操也算是个文化人，自然颇为欣喜，于是问道：耶？真有此事啊？从哪里考证出来的？

孔融的回话简单明了：不过是从现在发生的事情倒推上去，想当然耳。

这件事情有一点人身攻击的意思，曹操不太高兴，却没想到接下来，他想做什么孔融反对什么。

世人皆醉，唯我独醒。那必然是痛苦的。于是孔融选择一种对抗，可能他到最后都不太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只觉得只要路人侧目他就赢了，这是一种衡量方式：既然他的行为能让这些不正常的人不舒服，那么这些行为一定具有普遍正确性——

作为九卿之一，孔融上朝的时候不遵朝仪，不戴礼帽，在宫里上朝的时候溜达着就溜进了后宫……

孔融曾经对祢衡说，父亲对孩子有什么恩德呢？他不过是满足自己的情欲；母亲对孩子有什么恩德呢？孩子在她的肚子里就像是东西放在缸里，取出来了也就算了……

总的来说，曹操不是个滥杀无辜的人，然而，曹操终于对孔融开始感到头疼了——愤青可以容忍，因为他们有愤怒但是没有社会影响力，可是老愤青就要严格管制，因为这些人不但愤而且还能带领大家一起愤，这就叫社会不安定因素了。

建安十三年，曹操秘书班子给孔融的罪行拟定妥当。一共四条，哪一条也不是必死的重罪。孔融看到这份罪行的时候心里一定是开心的，对于一个生无可恋的人，死未必是一种惩罚，他甚至可能带有一种悲壮的殉道感。

孔融之死，妻子皆被诛。他用自己的生命的终结结束了儒家理想在这个时代实现的可能。只是可怜了他的两个小儿子。得到父亲被治罪下狱的消息时，两人正在下棋，却一动不动，没有一般孩子该有的反应。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当时一个七岁一个九岁的孩子的想法。知道的，只是这两个本可能和孔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再闪耀几许光芒的孩子，用超越年龄的镇定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找回失去的常识

畅销读物



编者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上海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梁文道 我读》是基于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而来的，这个节目通过主持人每天介绍一本书，让观众用最便捷的方式接触到书籍的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中世界。

这是一本近似于社会时评的文集，作者从某本书出发，引申出对社会、人生等各方面的看法，语调轻松有趣，以说故事为主，启发读者：书可以这样读。

[上期回顾]

从70年代大家的生活遭遇去观察中国语言文字的变化，梁文道感同身受。特殊的年代使得我们的语言变得贫瘠起来，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谈情说爱呢？

很多人都在怀80年代的旧，因为80年代是运动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80年代太特别了，那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解冻期，加上这些人自己都爱写书，也喜欢说话，所以那么多有关八零年代的书纷纷出炉上架，但是从深度跟广度上，目前还见不到有一本能像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这么好看。

说到查建英，她固然是80年代的过来人，而且她特别早熟，不只是小说写得好，后来用英文写了很多作品也非常精致出彩。

像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她访问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她的老朋友，也是80年代一些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或者应该说几乎都是一些“弄潮儿”。

访问文学评论家李陀的时候，他怀念起80年代，觉得跟今天对照有很多区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聊天聊出来的东西。

那个时候重友情，朋友多，而且都是那种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可以信赖、可以交心。那时候的朋友信赖到什么程度呢？有没有一个尺度？我觉得有，就是可以争论，朋友是可以争论的朋友，不是一般争执，而是凑到一起以争论相激，以争论为乐。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查建英虽然跟书里的甘阳、李陀等人立场不一样，但依旧能够谈得下来，即便可能常常会有一些激烈的争论，就是仗着当年交下来的友情。

说到甘阳，这位80年代的时候还非常年轻就已经成为文化热里其中一派思想领袖的人物，他也说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年他们这一帮知青，回到城里的时候，身上就会慢慢有一种江湖气。比如说会有一个口耳相传的圈子，会越传越多，

你在这里，别处人家会知道你，很微妙，流传实际上是很广，可以传得很远。”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晓得在北京某个地方一个小圈子里，你读书读得多，思想特活跃，才华特高，把一伙人都说服了，于是本来属于这个小圈子里关于你的想法会慢慢传出去，甚至传到好远的外省去，这就是甘阳所谓的“口传的圈子”。

仗着“口传圈子”里对他的推崇，后来甘阳在做起事来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帮助，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访问陈平原的时候他说：“我们批评当下学术风气败坏，往往举出80年代做对比，不知不觉中将其理想化了。作为过来人，我很欣赏80年代的生气淋漓，但我必须承认，80年代的专业著述多数是激情有余、功力不足。所以他们这一代人的工作，用胡适《谈新诗》里的一句话来总结，叫做‘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可是这些人在聊，总不能光是聊，他们总得有养分，那养分从什么地方来呢？

这些人总不可能是80年代改革一开放就从冻土里面长出一棵树来，所以肯定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潜流了。关于这一点，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说：“像当年上海轰动一时的十二人画展，就隐藏着这么一条线索。就是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短期的小规模现代主义，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而且后来资讯匮乏的时候，他们吸收资讯的方法也很特别。像著名画家罗中立的画里有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的影子，他是怎么认识到人家东西的呢？居然是在一张外国的旧报纸上面看到一个画面，就这样学会了一种外国绘画的方式。

前两年，查建英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的时候，曾经有人批评这本书以及里面访谈的那些文化名

人，说他们太自恋了，说这帮人老觉得自己80年代的时候牛逼、多了不起，然后就使劲回忆。其实仔细看完就会发现这本书完全不是这个感觉，相反，我觉得有很多的反省和反思，反省的正是一些关于80年代的神话。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人物，电影导演刘奋斗。其实刘奋斗本来就不算80年代的文化明星，相反，他是在80年代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跟我年纪差不多。

这本书找他有点像保持一个距离来重新反思甚至是批判80年代种种现象的感觉，而且他说话果然够狠。

他说：“整个80年代那种什么伤痕文学，包括小说，都是面目非常可怖、非常狰狞，很痛苦。我×，受苦了，我得赶紧跟哥们儿几个说说，我受苦了。我挺怕这种人的，我觉得这种人自己在心态上有点像街边卖大力丸的一样，拿起一块砖头‘啪’先把自己脑袋拍碎了，流着血说，大爷，您给一点儿吧，再不给多不合适，带着孩子不容易啊！”他用这么一个比喻也真够挖苦的。比如他批评80年代末期的那帮学生，他说：“事儿，我不相信，一个大便完了不冲厕所的人能管理好国家，你们是大学生，不是孩子啊……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是北大、清华那边，有的时候在教室、在学生宿舍和学生们打打麻将，我都能看到，我×，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十八九岁、二十多岁了，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大小便完了，您冲水成吗？我说你们真想要改变中国，先从大小便冲水开始。”

看来他实在太关心大小便冲水的问题了，他认为这是国家前途所系。后来他还批评了一下中国的文化艺术，大家都说现在中国的足球不行，可是刘奋斗有这么一个想法：

“中国足球队的水平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艺术界的水平。在这些方面我们并没有比足球表现得好多少，我们大家都是一些机会主义者。譬如搞电影的人，永远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跟热情在后面，总是做了一件事算一件事，慢慢一步一步改，一步一步来。”

他认为这样做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为什么大家瞧不起中国足球，却没有很瞧不起中国的文化艺术呢？“那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整个行业容易被遮羞，不像足球死得那么难看，立刻见真章。”

但是话说回来，80年代是否真的就那么不堪呢？这本书里很多人都提出了很深刻的批评跟反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80年代也有它的重要作用。像书里访问的阿城，阿城被誉为是这本书的受访者里面讲得最好的一个人，他说：“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大家重新拾回常识的过程。”

以前二三十年里面，中国逐渐出现了文化断层，很多常识不见了，怎么做人，什么叫做知书达礼，这些东西都没了，而找回常识或者说重新发掘人性的过程的感觉我们永远要记住，这对80年代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这本书里面还访问了陈丹青，他记得80年代早期，他到美国第二年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报道山东潍坊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他们笑着，一脸苦相，那种长期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刻印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国看这照片不知会怎样感受。我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能放风筝了！”